

結合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論

目次

壹、主要問題	/15
貳、文化研究的歷史	/17
參、論效度	/21
肆、其他效度	/28
伍、結合各種方法論	/33
陸、結論	/47
柒、練習一	/50

壹、主要問題

- 對生命經驗、文本或論述及社會脈絡間相互影響的興趣，建構出文化研究中的實證研究。最新的歷史及知識發展何以造成這三種研究領域的複雜情況？
- 「有效的」研究等於客觀的研究此古典概念為何有問題？有何其他關於效度的概念？有效的或好的研究所需條件為何？

- 根據「三角交叉驗證法」(triangulation)概念, 不同方法論可以結合, 以更接近「真理」。這種「三角交叉驗證法」有何缺點? 不同方法論可創造出不同的、並且可能無同一標準的「真理」之概念有何缺點? 加強不同取徑間的對話, 有助超越唯一真相的實證主義概念, 及強調多重真相的相對主義概念。以此角度出發結合各方法論的概念有何缺點?

實證研究中, 對生命經驗、文本或論述及社會脈絡相互影響的興趣, 是文化研究取徑的一項特色。摩利(David Morley)以閱聽人為對象的古典研究, 處理這三種社會現實的面向。摩利研究閱聽人對全國時事節目及節目報導一九七〇年代英國礦工罷工事件(British Miners' Strike, Morley and Brunson, 1999 [1980, 1987])的反應。結合這三項觀點, 摩利得以提出新的洞見, 瞭解媒體閱聽人的「活動」本質, 以及一個歷史轉捩點中介性、社會性及政治性的動能。本書的任務即在概述、討論文化研究中, 思考研究、進行研究以及撰寫研究的各種方式, 以對生命真實、論述式的中介(discursive mediation)及社會、政治的景觀這三方面的興趣為起點。

然而, 由於文化研究已臻成熟, 多項歷史發展也造成我們的社會真實和一九七〇年代的情況大不相同, 因此關於文化研究計畫的可行性, 出現了幾項具挑戰性的問題。有三項基本問題特別攸關研究方法論。首先我們會問: 對於和我們本身文化差距甚大的文化, 例如勞工階級或非西方的文化, 我們一定會有興趣嗎? 我們能瞭解、正確評論這些文化嗎? 第二個相關甚切的方法論問題是: 我們作為學者, 研究作為機制, 皆是文化及文化鬥爭(cultural struggle)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此一來, 我們要如何批判性地分析文化? 第三個問題的任務稍有不同, 問題在於: 在全球經濟不平等及剝削至

為嚴重的情況下，文化是最需要探究的重要問題嗎？

為了解釋這三種問題的意義，我們可以從摩利的研究中提出這些問題。首先我們可以問：摩利注意勞工階級生活的細微差別與矛盾到何種程度？從焦點團體中，他假設勞工階級終將「抗拒」保守的媒體報導。他如何解讀自己的假設？第二，我們可能會問：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和意識型態地位間有所關連。究竟馬克思的概念對摩利假設的影響程度為何？這是否造成摩利對不合乎此理論架構的其他問題視而不見？第三，我們可以問：對文化鬥爭(例如媒體內容及詮釋)的興趣，如何使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不再分析形成產業紛爭及各種產業的全球、經濟、政策之複雜過程？當然，這些問題並未讓摩利研究的里程碑完全失色。這些問題只是指出還有其他方式來研究生命經驗、論述及社會脈絡，而這些替代的取徑在文化研究中越來越突出。

文化研究中對當代真實中生命、論述及社會/全球的面向等三方面的研究興趣，是本書架構的中心。然而，除了討論研究此生命三領域的古典方法之外，本書還特別注意到新的研究取徑，例如新的民族誌、系譜研究及對全球化的分析。這些新取徑認真看待了文化研究提出的三個問題，並且企圖回應這些問題。然而，在我繼續討論這些方法論的研究之前，我要稍微岔題來討論文化研究的歷史。這段歷史有助釐清文化研究特殊方法論取徑的根源，以及當代方法論問題或挑戰的根源。

貳、文化研究的歷史

文化研究出現於一九七〇年代英國政治與知識的風氣

與環境中。當時務實的實證主義實證研究, 和功能論多所重疊, 並和傳統馬克思的政治經濟, 共同建構了社會研究的領域(Hall, 1982)。較右翼或較「行政」(administrative)的取徑會進行調查及小團體的研究, 目的在於證明多元主義及民主已成為戰後北美及西歐的真實。相較之下, 左翼的知識分子, 例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 便對流行文化及大眾意見有一連串尖銳的批判, 企圖證明戰後的消費文化及媒體已扼殺了社會批判及不同意見, 創造近乎法西斯式的「大眾社會」(mass society)(例如 Adorno *et al.*, 1950; Adorno and Horkheimer, 1979; Held, 1980)。

在這種堪稱兩極化的情況下, 文化研究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及之外, 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位置。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文化研究結合了人文主義、結構主義及新左派馬克思主義哲學(Hall, 1980)。文化研究中人文主義的部分, 試圖理解並捕捉人類的生命世界, 例如勞工階級文化中的創意潛能(Hoggart, 1992 [1957])。結構主義及結構主義的方法(例如符號學)重心是在文本(例如流行文化)中, 一再出現並造就我們思想的語言模式及比喻。新左派思想則很有興趣檢視生命經驗及/或諸多文本與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環境之關連。這三種哲學思潮有助文化研究成為右翼樂觀主義及左翼悲觀主義間的中介空間, 這種典範因此得以檢視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何是具有創意及批判潛力的戰鬥。然而, 人們的生命及想像力也侷限在充滿問題的文化意識型態及社會不平等的架構中。這種「中間立場」存在於古典伯明罕時期研究媒體閱聽人(Ang, 1985; Morley and Brunson, 1999[1980, 1987])、次文化(Hall and Jefferson, 1976; Hebdige, 1976, 1988)及中產階級男孩與女孩(Willis, 1977; McRobbie, 2000)的著作中(概況請見: Hall *et al.*, 1980; Gurevitch *et al.*, 1982)。

然而, 如文化研究中的政治及哲學根源所顯示, 從一開始, 方法論的研究就充滿了緊張。我們無法在不產生矛盾的情況下, 藉由現象學或詮釋學的驅使來「瞭解」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的創造性生命世界, 同時又懷著有距離的、批判結構主義式的興趣來「分析」語言比喻(這種比喻會引導人的感受及理解)。再者, 無論是對生命現實的興趣, 或是傳達出我們對真實之感知的文化及語言, 都不符合發表關於社會及政治情況言論的趨勢。在某種程度上, 這種趨勢和找出世界或真實「為何」的努力有所關聯。

在文化研究的初期, 科學客觀性的實證主義概念仍可以弭平這些矛盾。然而, 在二十一世紀初期, 受到一些發展的影響, 文化研究中三項古典領域間的差異已經擴大且變得模糊。這些發展常會統一冠上同一些詞彙, 例如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晚期現代性(late modernity)、後工業主義(post-industrialism)、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 還有更近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例如 Harvey, 1989; Jameson, 1991; Rose, 1999; Tomlinson, 1999)。即使環繞這些現象的討論有時成為不斷變動的知識潮流之記號, 這些討論仍指出重大歷史及知識之歷程或轉變, 這些歷程或轉變改變了社會真實及研究的面貌。

首先, 從一九六〇年代起, 女性、黑人、各種後殖民者及他們的運動, 便開始控訴各種機構將歧視機制化, 這些機制包括國家、教育、媒體等。他們也指控研究並未描述女性、少數族群或後殖民者的真實, 雖然一直對社會地位低的族群有特殊興趣, 但只是利用這些人支持學者理論及政治上的計畫, 從殖民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到自由的人文女性主義皆然(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Said, 1995[1978])。第二, 媒體越

來越充斥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長時間看電視到最近長時間上網就是證明，這讓我們的日常生活及經驗變得更「虛擬」(virtual)(Baudrillard)，這些新的技術及經驗已經侵蝕了我們對媒體或科學能力的信念。過去我們認為，媒體或科學能替我們「客觀」地描述真實，允許我們能批判性、甚至諷刺性的體會到，何以所有對世界的瞭解都藉由文化影像以及論述傳達出來。第三，二十世紀末歷經了一連串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歷程，這些歷程破壞了對戰後政治及經濟局勢及意識型態的信念。對各種左翼的計畫來說，一九八九年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傾頹不啻是一種打擊，也造成這些計畫重新轉向。西方戰後仍懷抱「進步」或「現代化」的夢想，這原本應該能將西方的富庶及民主傳遍全世界，但這種夢想也遭到破壞，從未實現。因此，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我們已經覺醒。值此之際，關於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熱烈討論與創造、傳播其他替代方式的可能性間產生新分野，加上先前受到壓抑的知識與文化，以及不同族群人士間強烈的不平等、不信任和仇恨，都建構出這個時期的面貌(Castells, 1996, 1997, 1998)。

作為知識與政治計畫的文化研究，已主動研究、運用這些歷史及社會的發展。同時，這些發展也在文化研究的範圍之內及邊緣，帶來新的研究及方法論方向。打著新民族誌旗幟的眾多學者，已發展出研究的合作或對話模式，試圖更真實瞭解他者的生命世界。後結構主義造成自省及系譜式的分析策略，這些策略批判性地研究了那些引導人(包括學者)理解自己及自己計畫的論述之歷史、社會及政治信念。針對全球化的分析提出了較「複雜」的方式，以理解經濟、政治等發展，這些發展挑戰了傳統較簡單或線性的分析模式及預測。

這些新的調查方式源自於目前同樣的歷史情況，其特色是意義更加不明確。然而，這些調查方式彼此間的緊張狀態，就和早期文化研究中三種方法論潮流彼此間產生矛盾的方式類似。新的民族誌調查力求忠實於他者的生命真實，後結構主義的目的，則是批判分析塑造我們經驗的事物之論述，兩者產生了矛盾。理解「真正」複雜的當代全球經濟及政治歷程、架構之目的，亦難以與新的民族誌及後結構主義之堅持結合在一起。新的民族誌及後結構主義都堅持有多重「真實」。這些矛盾和挑戰帶來的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些共通之處，來決定構成「良好」或「有效的」研究之條件。在傳統方法論的說法中，「效度」是所有研究的起點及終點，這指的是一系列如石蕊試紙般的測試，決定研究是否「真實」或「客觀」描述事物的「真實面貌」。目前的討論指出有多重真實，因而引起了研究是否為一種主張的問題。若果真如此，書寫方法論的書籍就沒有意義了。我認為仍有指導方針能指出構成「良好」及有效的(如果不是真實的)研究之條件。

參、論效度

一、米德及關於薩摩亞的「真相」

在繼續解釋我與他人所謂的好的或有效的研究之前，我要帶領我的讀者步上一小段旅程，行至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到一九二〇年代米德(Margaret Mead)對薩摩亞的研究。這麼做的理由是米德的古典人類學已成為關於效度之論戰的焦點。米德死後不久，弗利曼(Derek Freeman, 1983)便宣稱米德

的研究完全無效、錯誤，或只是一個大謊言。這場論戰成為許多研究方法書籍的主題(例如 Lincoln and Guba, 1985; Seale, 1999)，有效地解釋了和傳統效度形式有關的議題及問題，並有助奠定討論新的效度之基礎。

米德的著作《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出版於一九二九年。在此書中，米德著手研究青春期，並提出問題：「究竟是青春期本身的特質，抑或文明，困惑了我們的青少？」(Mead, 1929: 11)。這項研究重點在於青春期的女性，當時為年輕女性的米德，對她們感同身受，她的結論為：薩摩亞的青春期和西方不同，並非充滿衝突及紛爭的時期，而青少年剛萌芽的性慾亦非巨大焦慮或壓抑的來源。此書一開始的段落，便能讓人一窺米德所描繪的薩摩亞性生活之面貌：

曙光開始降落在棕色、輕軟的屋頂，細長的棕櫚樹挺立著，襯托出不帶色彩而閃爍的海面，這時，棕櫚樹下或海灘上獨木舟影子下的幽會結束，戀人們偷溜回家，光線會照到每個在裝飾好的家園睡覺的人(Mead, 1929: 14)。

一九八三年時，弗利曼出版了《米德與薩摩亞：一項人類學迷思的建造與拆解》(*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著手反駁米德的考察工作。他認為薩摩亞並非如米德所描述，是和諧及在性方面放縱的原始社會。反之，薩摩亞人極為尊崇婚前守貞，在那些島上，暴力和強暴事件則是司空見慣。弗利曼對

薩摩亞人性的習俗之概念描述如下：

一九五九年六月的某個週日，十七歲的陶塔拉福亞(Tautalafua)發現他十八歲的表姊(classificatory)那天晚上九點鐘左右和法夫(Vave)坐在麵包樹下。法夫是來自另一個家族的年輕人。陶塔拉福亞暴力毆打法夫，把他的下巴打成兩半。因為這項攻擊，他之後被判六週的監禁(Freeman, 1983: 237)。

緊接在這項爭議之後的，是大眾與學界熱烈的辯論。不同參與者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爭辯這項問題，而在《美國人類學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Brady, 1983)的特刊中，一批研究薩摩亞的專家群起攻擊弗利曼。米德在馬努亞(Manu'a)遙遠小島進行調查研究，弗利曼自己則在烏波盧(Upolu)的主要島嶼上進行研究，這些專家批評弗利曼將兩者相提並論。這些專家也指出，基督教傳教士的影響在一九四四及一九六〇年代，對薩摩亞文化有較大影響，當時便是弗利曼進行研究的時期。在米德造訪那些島嶼的一九二〇年代，薩摩亞文化受到的影響則較小(Weiner, 1983)。再者，他們也提到身為年輕女性的米德利用青少年作為消息來源，而弗利曼的描述則來自自有地位的成年男性(Schwartz, 1983)。

然而，兩位學者間最大的爭執點在於他們的典範方向。米德的根源來自於文化主義(culturalist)典範，她指出一般認為是全人類共有的行為(例如青春期或性慾特質)，已成為文明的結果，「出現在一個國家的居民身上，在另一個國家的居民身上則不存在，而且並沒有跟隨著種族的改變」(Mead, 1929: 4)。一九二〇年代好戰的種族主義以基因差異的角度解釋了優生運動，塑造了米德的文化主義計畫，以及(性)自由

的潛在意涵，但米德也反對這種運動。相較之下，弗利曼代表了晚期的社會生物學立場，其著作最後一章便說明了這一點。這最後一章中，他提到薩摩亞某些暴力事件，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常規行為遭到捨棄，人受到「極為情緒性及衝動，而且殘暴宛如動物的行為」宰制(Freeman, 1983: 301)。就他的觀點來看，這種侵略行為就是「古老甚多且依種族而形成之架構」之證明，而這種架構除了定義文化外，也定義了行為。因此，在米德和諧文化之處，弗利曼卻發現了「原始」或生物的侵略行為。

兩位作者間典範上的差異也反映在他們的寫作風格上。米德的書具有印象派的風格，目的在捕捉薩摩亞生活的特質，有時候讀起來像浪漫的旅行紀錄片。相較之下，弗利曼便遵循古典科學寫實主義的報導方式，而他對米德的「駁斥」，充滿極小的數目細節，例如一天中精確的時間，因此讀起來就像警方紀錄或法庭案件。

這場論戰教導我們的不在於米德或弗利曼對薩摩亞的看法孰「是」孰「非」，而是闡明至少有三項問題造成與薩摩亞相關的「真實」變得複雜。首先，是薩摩亞本身的流動性(不同意見、團體、歷史變遷等)，接下來是建構學者研究的信念(歷史、政治及理論的投入)，第三則是用來描述薩摩亞的語言(印象派或寫實派)。為詳加解釋這三項問題，一開始要說明薩摩亞並非固定不動的研究客體，而是多面向、矛盾的(Shore, 1983: 943)或如阿米巴原蟲般的研究客體，它會從一個角度立刻轉變為另一個角度。薩摩亞有少女、村莊中的長者、神話、習俗、不同的規則、機制化及非正式的侵犯行為、以階級及性別區分的社會與政治分際、爭鬥及觀點，而這些事物一直在進展及轉變。第二，人類學家的觀點會受到個人性別、種族及年齡，以及典範及政治聯盟影響。如同克

力福特所言,米德和弗利曼兩人都將薩摩亞描述為西方世界的預言或諷喻,而兩人對立的解讀方式最後總結了西方關於「原始」的概念中存在的古典對立:阿波羅式的感官天堂及酒神戴奧尼斯式的暴力和危險。第三,經過證明,語言並非溝通的中性媒介,而是訊息的一部分。米德大略的印象派風格,勾勒出一幅夢幻、外觀柔和的薩摩亞畫像。弗利曼利用赤裸裸的客觀派寫實主義(如警方記錄一般)呈現給我們侵略性的薩摩亞人面貌,且描述了反對米德的法庭案件,這種結果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性並不會少於米德的書寫內容。

類似米德的爭議有很多,其中有些最知名的例子挑戰了懷特(W.F. Whyte)的《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Whyte, 1955[1943];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1992; Whyte, 1993),最近的則是曼朱(Rigoberta Menchu)關於瓜地馬拉種族屠殺的自傳(Menchu, 1984; Beverly, 1999; Stoll, 1999; Arias, 2001)。這些持續的辯論,說明了我們繼續執著於爭論,決定何種研究「真實」、「有效」,而誰的研究「錯誤」或「有偏見」。

二、從單一效度到多重效度

米德的爭議根植於科學的實證主義概念,這種概念瞭解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創造真實、客觀的社會真實之知識,並遵循科學方法。實證主義研究的目標在於製造有效的結果,這種結果一般認為不遜於「真實」(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95)。因此,要討論的就是米德或弗利曼是否說出「事實」,而且是以什麼為基礎。

實證主義對真實性或效度的條件,一般認為是普世一致的,這代表無論研究者想掌握的是「客觀真實」(社會事實,

例如經濟發展)抑或是人們的主觀或交互主觀的經驗(人給予生活及行動的意義), 都應用了相同的真實規則, (Alvesson and Skoldberg, 2000: viii)。米德與弗利曼的爭辯牽涉到關於薩摩亞社會、特質的一般事實, 也牽涉到薩摩亞人對他們自己生活及活動的看法, 而弗利曼認為米德在兩個面向上皆「錯」。

在實證主義方法論中, 關於真實的普遍目標轉換成一連串鉅細靡遺的程序及檢查。我不會長篇大論描述這些檢查(請參見 Lincoln and Guba, 1985; Seale, 1999, 內有精闢的概述)。然而, 米德和弗利曼的爭議顯示出他們的問題。在研究中, 效度的其中一項重要條件是「可信度」。可信度指的是下列概念: 不同學者進行同樣的研究, 仍會提出同樣或相似的結果。然而,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有人把米德和弗利曼都送到薩摩亞, 他們絕對不會互相同意, 或達成「評估者之間」的共識。他們的理論和政治信念差異甚大, 可以說他們看的是不同的薩摩亞。在研究中另一項效度的條件是中立度(neutrality), 這指的是學者必須確保個人或政治信念不會造成研究中的偏見。米德和弗利曼的爭議闡明了學術就像其他社會活動, 必定會成為歷史、社會、政治及理論環境及其信念的一部分。再者, 檢視米德和弗利曼不同的書寫類型之後, 也會特別顯示出我們用來報導我們發現之物的語言不可能中立, 原因是所有語言都是社會的、文化的, 不可能是透明的媒介, 可以「如實」描述真實(MacCabe, 1973)。

儘管我們幾乎無法提出關於薩摩亞的「真實」, 但在類似薩摩亞或其他環境中進行研究, 仍有較好與較差的方式之別。傳統效度似乎不再適用之後, 學者設法想像好的研究指導方針及條件應該為何, 並開始提出其他關於單一效度(例如 Lincoln and Guba, 1985, 1994)及多重效度的概念(Lather,

1993)。談論多重效度而非單一效度有兩項好處。首先，大家會注意到作為我們研究基礎的理論、方法及書寫模式，能夠開啟對真實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必定是局部的、政治的。學術界不把這種情況視為不良行為，反而認為多重效度會要求我們更批判性地注意到驅策我們研究的事物為何。第二，承認瞭解社會現象的方式不只一種，會要求我們提出更多面向、更細緻、更審慎的方式來瞭解研究對象。米德關於薩摩亞之研究的論戰最後成了彼此叫囂，爭論薩摩亞過去、現在是阿波羅式的天堂還是戴奧尼斯斯式的地獄。多重效度指出我們若要接近真實，便不應該以那麼截然二分(「真實」或「錯誤」；「對」或「錯」；「天堂」或「地獄」)的詞彙進行研究，而應該以更複雜的詞彙來研究。

多重效度的概念並不代表進行研究沒有規則可循。這只代表並沒有普世一致的規則可適用於任何地方，反而存在不同規則，我們必須瞭解這些規則如何以不同方式，產生我們與真實間的關連。利用米德的爭議、文化研究中方法論的重心，以及其他關於替代效度的作品，我們可以勾勒出三項大致上不同的方法論取徑，每一項取徑都依循不同的效度概念。第一種是詮釋方法論取徑，這種取徑遵循我所稱的「對話性」效度。所謂對話性效度，指的是以研究嘗試捕捉他者生命真實的良好程度來評估一項研究。因此，這種取徑會以研究嘗試捕捉薩摩亞人生命真實的良好程度之角度，評價對薩摩亞之研究的價值。第二種是後結構的方法論取徑，這遵循我所稱的「解構性」(deconstructive)效度，此外，這種取徑評估研究價值的方式，是觀察研究是否充分解決有問題的社會論述，這種論述會傳達我們感受真實及他人的方式。因此，後結構的研究會以研究如何披露殖民者比喻的完整程度來評價對薩摩亞之研究的價值；殖民者比喻會描述薩摩亞的

「原始」感官享受及危險。第三是寫實或脈絡式的方法論取徑，這遵循脈絡性效度。研究對社會、經濟及政治脈絡的理解程度，與各研究現象間關連的理解程度，便是脈絡性效度評價研究的角度。因此，這種方法論取徑評估薩摩亞研究具有多少價值的方式，是藉由檢視相關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徹底地、縝密地描繪了內外部的權力及不平等結構，這些結構包括階級的階層分佈、謀生型態、殖民式的政治、貿易及文化等，皆會形塑薩摩亞村落長者及青少女的生活。

這三種方法論取徑以及伴隨而來的多重效度，大致上符合早期文化研究中「人文主義的」、「結構主義的」及新左派「脈絡式的」傾向。這三種「新」方法論取徑、效度，與舊有的效度概念間也有類似之處。然而，儘管存在延續性，但大體而言，這三種方法論/效度將文化研究及社會科學推向了新的方向。接下來，我會討論這些新的取徑/效度如何延續舊有的研究方式，並從中另闢蹊徑。

肆、替代效度

一、對話性效度

在開始更仔細討論詮釋性取徑及伴隨的「對話性」效度之際，可以說其評價研究的角度，在於研究捕捉研究對象生命世界真實程度如何(Lincoln and Guba, 1985, 1994; Lincoln, 1995)。這種大原則可以進一步細分為「良好」或有效的研究之三種特定條件：

1. 真實性(Truthfulness)：研究應該公正評論研究對象的觀點，如此一來，研究對象便能同意這項研究。這代表了合作型態的研究，例如利用方法賦予研究對象(例如薩摩亞人)對他們被研究及表現的方式發言權〔在傳統的研究說法中，表現指的是「參與者檢核」(member check)(例如 Seale, 1999)〕。
2. 自省性(Self-reflexivity)：研究應該反省引導他們感受真實及他者方式的個人、社會及典範論述。這代表學者必須嘗試更能理解文化的包袱，例如關於「原始」的概念。這些包袱傳達了他們對不同世界的理解。
3. 多音性(Polyvocality)：研究者應該要注意他們不是研究一個生命真實，而是多個生命真實。這代表他們應該確定他們納入了主要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s)，例如年輕女子及村落裡的觀點及聲音(Lincoln and Guba, 1985)，嘗試如實呈現他們的多樣性及彼此間的關係及緊張。

● 對話性效度讓人想起舊有的民族誌目標，亦即捕捉「原住民的觀點」。和舊有的民族誌計畫不同的是，對話性效度並未宣稱擁有某些有特別好處的「客觀」位置，可以描述他者的生活。對話性並不以從外界描述他者世界的角度來看待研究，而是以不同世界間的接觸或互動來看待。因此，這種取徑的效度主要判準，便是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達成尊重、忠於他者生命世界及真實之要求。

二、解構性效度

後結構主義的研究及伴隨而來的解構性效度用以評估研究的方式，是藉由檢視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拆解了社會比

喻及論述，這些社會比喻及論述會隨著時間演進而成為一種世界的「真實」。有三項後結構的策略，可以闡明傳達我們對世界之理解的論述。這三項策略構成了傳統之內良好研究的三種不同條件：

1. 後現代逾越(Postmodern excess)：後現代或布希亞式(Baudrillardian)(1980; Lather, 1993)的論述「逾越」概念，指出可能有無窮盡的「真實」或接近真實的方式。因此，研究如何設法強調理解特定現象的不同方式，以去除任何「固定」的理解，便是評價研究的角度。弗利曼與米德的爭議便是後現代提問的範例，原因是這項爭議強調關於薩摩亞有無數不同的「真實」。
2. 系譜歷史性(Genealogical)：系譜學和傅柯的著作(Foucault, 1984)有關，藉由暴露歷史性，挑戰了真實。因此，研究如何闡明某些一般視為理所當然的真實為何並非普世一致或永垂不朽，而只是特定歷史或政治計畫的產物，便是評價研究的角度。其中一個例子(系譜研究)便是米德及弗利曼作品的歷史、政治及理論信念之分析，他們的信念造成他們所呈現的薩摩亞面貌截然不同。
3. 解構性批評(Deconstructive critique)：解構和德希達的著作(Derrida, 1976)有關，目的是質疑組成我們思想的二元對立，以暴露其隱藏的政治信念。因此，研究如何設法揭露構成我們對特定現象理解之基礎的基本二元對立，便是評價研究的角度。分析「原始」社會感官或侵略本質，及米德和弗利曼作品中交錯的西方世界「文明限制」間的基本二元對立，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後結構的批評有時會讓人想起研究或新聞報導中找出「偏見」的傳統研究作法。然而，後結構主義與這種調查方式的不同之處，在於認為理解世界沒有「全無偏見」的方式。因此，後結構主義對於良好的研究之概念是雙重的。首先，良好或有效的研究被認為暴露了社會「真實」的歷史性、政治投入、疏漏之處及盲點。第二，良好或有效的研究也被認為注意到本身的歷史、政治及社會投入，並持續反省本身信念。

三、脈絡性效度

社會脈絡性的研究及其伴隨而來的脈絡效度，涉及了研究定位(locate)現象的能力；這種研究是在廣泛的社會、政治脈絡，甚至是在全球脈絡中進行探究。由此觀之，脈絡性是某種型態的寫實主義，必定會說明世界的「真實面」。這種寫實主義的基礎，與詮釋性及後結構的方法論、效度抵觸，後兩者皆強調有多重的「真實」，從不同的社會位置或歷史時間觀察世界，世界就會有不同的面貌。然而，對話性和後結構主義都受到民主及平等主義的刺激所驅使，會傾聽各種聲音，挑戰各種權威論述。或許這些取徑認為本身傾聽被壓抑的聲音或挑戰權威論述時，也會宣稱某些人權力較大，某些人權力較小，可以讓自己的聲音傳出去，而有些論述也會比其他論述更有力、更有權威。為了提出這些說法，學者必須訴諸某種社會及歷史脈絡的概念，以及不平等的架構，並需要某些分析這些概念、架構的條件。然而，脈絡性效度指的不僅是要求理解社會脈絡，也是指要求理解研究在脈絡中如何佔有一席之地、如何形塑脈絡。研究中這種捕捉社會脈絡任務的雙重本質，可藉由脈絡性研究的兩項條件大致說

明：

1. 對社會脈絡的敏感度：這指的是學術界的責任。舉例而言，學術界必須審慎分析歷史事件、統計數字及發展，使用並比較不同的資源及觀點，這就代表研究不可雜亂無章或純粹依賴直覺。從這個觀點研究薩摩亞，代表仔細分析這些島嶼的歷史、社會架構，及其透過商業、傳教士甚至人類學家與外界產生的互動。即使米德和弗利曼都討論了薩摩亞的社會脈絡，但社會脈絡充其量只是他們計畫的背景。他們的計畫是捕捉相較下永恆的「原始」社會之「本質」。
2. 對歷史性的體認：這項條件指的是研究瞭解本身歷史性的能力。因此，針對薩摩亞的研究必須體認研究在薩摩亞構成之社會脈絡中的意義。這些社會脈絡可能包括殖民主義的架構或反殖民的對抗活動(請參見 Bhaskar, 1979)。這代表社會科學及其研究對象——歷史社會無法二分，而分析社會脈絡也使研究更能體認到本身在社會脈絡中扮演的角色，也能更批判性地評價這個角色。

舉例而言，文化研究有時會遲疑是否要針對社會或經濟架構等方面發表長篇大論，原因是文化研究認為我們無法在沒有文化及語言作為中介的情況下，描述那些架構。然而，文化研究常會提到某些文化行為鞏固了階級、種族或性別等不平等之處。脈絡性效度概念強調的是，我們必須對那些說法更為小心。舉例而言，我的博士班學生最近開始研究關於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間衝突的史實，目的是脈絡化她對以此為主題的電影之分析。她很快發現，在衝突之上的並非「單一」歷史，而是許多複雜且有爭議的歷史。這強調了兩件事。首

先，我們應該仔細分析歷史及社會的「事實」，注意細節、複雜的過程及不同的觀點，並且不隨波逐流，聽信一般認定的假設，或帶有侵略主義的基礎教科書。第二，我們必須體認到我們的描述絕對無法與歷史分離，必定是具有歷史性與政治性的，也會與我們研究的景觀相互形塑。

上面舉出的效度並不在於列出完整的清單，而是配合本書目的，大致說明文化研究中某些質性研究的重要模式。關於效度的不同概念會使我們注意到單一「真實」的效度概念並不可行。列出效度也說明了捨棄了單一效度，並不表示研究中「無法可循」的狀態。反之，各種效度都針對良好的研究，設定了特定的指導方針、規則及條件。

伍、結合各種方法論

一、三角交叉驗證法

檢視三種不同類型方法論取徑的列表，及伴隨而來的各種不同效度會造成一項問題：是否有方法能將三種取徑納入一項研究計畫中嗎？畢竟，若要繼續文化研究的傳統，研究生命經驗、論述、文本與歷史、社會、政治脈絡間的相互影響，結合各種方法論是必要的。

很顯然，我們並不一定需要結合各種方法論，有許多研究計畫僅遵循這些效度中的其中一種規則。有些新民族誌計畫於努力忠於權利常遭剝奪者(disenfranchised)的生命世界。很多媒體文本的批評分析也以同樣的方式進行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批判媒體文本建構權威性真實的方式。如同前述，

忠於人的生命真實可能很難結合批判性的論述分析，而這些論述構成了人生命真實的一部分。同理，分析全球及社會架構可能會抵觸，或只是超越人對其環境的地區或生命感受。

然而，如果我們想結合各種取徑，就需要一套架構襄助。傳統的社會及文化調查指的常是以「三角交叉驗證法」來結合不同理論、方法、來源及材料的技術(Denzin, 1989; Flick, 1998)。三角交叉驗證法的古典目標是結合不同種類的材料或方法，試驗彼此間能否互相合作。舉例而言，我們可以因此參閱文件及殖民的檔案，補充對薩摩亞的參與觀察，以找出是否有人「說謊」或記錯事情(事實上，這很接近弗利曼理解及進行其計畫駁斥米德的方式)。整體來說，三角交叉驗證法的古典目標是從社會世界獲得更準確或更真實的面貌，這種目的反映了三角交叉驗證法的原始意義。三角交叉驗證法來自航海，指的是使用不同的方位來指出目標的正確位置(Silverman, 1992: 156)。

三角交叉驗證法可解釋為是對真實的追求，但對上述結合三種方法論取徑的方式，並沒有特別的用處。這是因為這些取徑的基本目標是製造出關於「真實」之簡單概念的問題。對話性企圖忠於觀察對象的生命世界，其目的不在設法找出那些女孩或村落中的長者是否說「實」話，而是想捕捉兩者不同的世界觀。系譜學會指出我們無法從殖民檔案等類似的東西中發現真實，原因是這些檔案是一種場域，「製造」具有歷史及高度政治性的真實(例如「難以駕馭」等)，這些真是與受「控管」的人與地方相關。舉例而言，弗利曼對薩摩亞人侵略行為的部分證據，來自殖民政府對島上「麻煩人、事、物」的報告。我們可以很自然地認為島上有暴力存在，但這樣的檔案必定會把重點放在暴力之上，原因是這些檔案就是「管理」薩摩亞群島的日誌。最後，這會使人獲得

脈絡性的深入觀點，瞭解研究永遠不可能客觀，原因是研究必定是其研究的社會景觀(例如殖民主義的架構)一部分，並且影響了社會景觀。

為了瞭解實證主義三角交叉驗證法的特殊本質，並能夠將其與其他結合各種方法論的方式相比較，分析這種驗證法如何理解本體論(ontology, 真實的本質)及認識論(epistemology, 知識的本質)會有所幫助。古典的實證主義認為真實是「固定的」。因此，在古典物理中，物理真實被理解為是可知且相較下穩定的「客體」(object)，可以透過使用科學方法(顯微鏡、計算等)準確觀察。同理，在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中，社會被理解為是可觀察的實體，會保持不變，可利用統計、調查及訪談加以理解。如同我們在米德的爭論中所見，這種本體論立場的問題是，真實並不會維持固定，而是像阿米巴原蟲一般，多面向、持續演變，從不同角度看會有不同的面貌(從少女、村落長者、殖民檔案等觀點看待)。

相信「真實是固定的客體，真實是與研究分離的」本體論觀念，告訴了我們實證主義認識論的研究目標是「反映」真實。根據實證主義，使用這些方法(對話分析、符號學、統計分析)的原因，是為了更接近關於真實的「真相」。不同的方法可視為是「放大鏡」，幫助學者更清楚看見真實，或者以較不帶偏見、更系統化的方式看待真實。結合不同方法的目的，在於使用不同的鏡片，設定清晰度最佳的視野。因此，實證主義討論如何進行研究常頗具技術性，目的是將方法的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以正確捕捉真實。然而，研究自外於真實，或利用方法使其超越真實之上的看法並不可行，原因在於研究是一種社會活動。米德和弗利曼的研究都與研究當時的社會關懷有緊密關係，都將薩摩亞呈現為其政治信念的寓言(Clifford, 1986)。我們不必將其視為不當行為，反而可以

問還有其他哪些可能性？在沒有社會議題的情況下，社會調查的目的又是什麼？但實證主義否定政治議題的問題是政治議題成了眾人垂涎之物；這種否定被推到永恆真實，而非政治辯論及決策的範疇。米德和弗利曼將自己的研究，塑造為對「原始」社會不帶偏見的永恆「真實」，而不將自己對薩摩亞的評論視為對人類本質熱烈、具高度政治性及爭議性的(後)現代辯論一部分，就是明顯的證據(參見表 1.1)。

實證主義的本體論及認識論計畫最近廣受質疑。在物理學中，所謂的「量子物理」(quantum physics)說明了對物理現象的研究並不只是單純描述這些現象，而是干涉或改變這些現象。在社會科學中，這一點更為明顯，因此馬克思主

表 1.1：結合各方法論的典範

典範	本體論	認識論	隱喻	研究目標	政治信念
三角交叉驗證法	固定真實	反映真實	放大鏡	真相	無偏見
稜鏡法(Prisms)	流動真實	真實的社會 建構	折射影像 的稜鏡	傳達多重 真實	多元主義的 科學及社會
物質(material) 符號(semiotic)	互動真實	真實的物質/ 符號建構	繞射光線 的稜鏡	創造平等主 義的真實	平等主義的 科學及社會
對話	互動真實	真實的物質/ 符號建構	對話	多重真實 間的 對話	平等主義及 多元主義的 科學及社會

義是一種科學計畫，不僅描述十九世紀的工業社會，還大力扭轉這種社會，而促成東歐國家社會主義(state-socialism)以及西方福利國家的建立(Bhaskar, 1979)。由於研究本身既有的政治本質，因此我強調本書主要重點在於「方法論」，而非「方法」。方法論的概念會使人注意到我們使用來理解真實工具和取徑(方法)，不僅是中立的技術，也帶有知識或意識型態

(「邏各斯」(logos)), 這常使「真實」看來大為不同。我的目的不在幫助讀者擺脫這種對所有研究既有的「偏見」, 而是使他們更能體認到根植於我們研究取徑中的世界觀和政治信念, 以促進更好、更平等的研究, 以及更好、更平等的真實。

二、作為稜鏡的研究

李察森(Richardson)認為不應該討論三角交叉驗證法, 而應該開始討論以結晶化(crystallization)的角度來結合不同進行研究及書寫研究的方式。李察森指出, 結晶體就是稜鏡。因此, 結晶體不僅「反映外在性」, 也「在其本身折射這些外在性」(Richardson, 2000: 934)。結晶體的隱喻說明的是, 我們改變看待真實的方法論角度或觀點時, 真實改變的方式。

研究稜鏡的概念所循之本體論及認識論和實證主義的本體論、認識論大為不同。研究稜鏡認為真實是流動的(本體論), 研究任務並非準確描述真實, 反之, 研究應該創造其研究的真實, 或以社會建構的方式來塑造真實(認識論)。這種觀點並不認為研究是從外界描述真實, 而是將研究置於真實之中, 作為「製造」真實的過程之一。研究的稜鏡理想努力的計畫, 常會強調對真實的多重觀點, 或是多重真實。這種理想的特定目標是挑戰固有的概念, 亦即僅有唯一方式看待(單一)真實。在這種典範下工作的學主對創造「替代」真實特別有興趣。「替代」真實抵觸了廣為接受的科學真相。這種計畫的某一部分便是賦予受壓抑或次等的知識或真實聲音。認同研究是稜鏡此概念的學者指出, 科學在過去一直是封閉的領域, 由擁有特權的西方白人男性把持, 在未來也會如此。他們提出的定義及決定對我們的生命有深遠的影響,

且全部披上無偏見的科學「客觀」之名(一般批評請參見 Haraway, 1997: 24-31 及 Harding, 1991, 1993; Latour, 1993)。因此, 認同研究是稜鏡的學者已發展出一些進行及書寫學術研究的方式, 這些研究方式是較為準確的, 諸如女性及非西方人士敘述世界以及相互交流關於世界的想法之方式(亦請參見 Narayan and George, 2001)。可作代表的一個例子就是李察森(Richardson, 1992)所寫的一首關於一名女性生命故事的詩 路易莎·梅 (“Louisa May”), 李察森訪問過這名女性, 作為一項研究未婚媽媽計畫的一部分。透過這首詩, 李察森希望以她特有的語彙和南方韻律來傳達出路易莎的生命, 而不只是使她淪為階級、教育程度等統計、社會學中的其中一種類別。因此, 方法論和書寫策略並非視為所謂「客觀」反映真實的手段, 而是學者使用來創造、傳達不同真實的工具(請參見表 1.1)。

回到我上面概述的三種方法論取徑及效度, 稜鏡的概念會適用於結合對話性效度(傳達新的/受忽略的真實)以及解構性效度(拆解舊有的權威性真實, 例如男性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真實)。對話性和解構性的工作都注意到語言及研究「創造」不同真實的方式, 並提供工具, 以利批判性分析主流真實, 並創造替代的真實。

然而, 稜鏡的概念卻和脈絡性效度格格不入。舉例而言, 若我們以全球經濟各種不平等的架構來思考脈絡的問題, 便可說我們能從截然不同的觀點對這些架構有截然不同的看待方式。然而, 就各種全球架構來看, 卻有一種不動如山的「真實」面, 在任何地方都有相似的面貌。即使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可能體驗了天差地別的經濟和政治過程, 這些過程仍影響了所有人, 將我們的真實與命運綑綁在一起。將方法論視為傳達不同真實的稜鏡之概念, 常認為其任務在

理解差異，或瞭解我們感受世界的方式，可能只是其中一種方式。我們可以說其目標在於提升不同真實間的理解或對話，舉例來說，使我們對不同的世界產生同理心及認同感，例如路易莎·梅的世界。強化這種認同感或理解的好處無可否認。然而，這不適用於分析全球經濟發展如何以類似及不同方式來影響我們等情況。因此，對於發展會結合人群以共同轉變這些架構的政治或政策計畫，這就無法適用。

我們可能會說，若我們把米德的書寫移動七十年，她對薩摩亞年輕女孩印象派式的描述方式就很接近稜鏡的觀點，強調一種不同的方式，與先前遭忽略的世界產生關連(此處我們必須記得在米德的時代，女性學者及從女性出發的觀點甚為稀少)。然而，即使其紀錄開啟了一扇窗，通往了一個令人神往的嶄新世界，這個世界似乎仍漂浮於永恆的疏離狀態中。對於作為文化、政治、經濟及軍事過程的殖民主義如何塑造薩摩亞，我們所知有限。因此，除了同為人類之外，我們幾乎找不到方式，想像我們的真實與他們的真實連結在一起，也想像不到如何構築與其有關的某種集體計畫或政治。

三、物質－材料觀點

如果實證主義研究的問題在於其認為僅有一種真實的「真相」，那麼遵循「稜鏡」概念的研究之問題就在於該研究真相是無止無盡的，或者是多重的。如果實證主義專斷地強加本身的真相於其他觀點上，那麼稜鏡的概念和無法以同一標準計算的多重事實，便會讓人難以想像開始共同改變我們共有真實的各種政治。若要設法找到兩種位置的折衷之處，哈樂葳(Donna Haraway)的「衍射」(diffraction)方法論概

念會很有幫助。衍射的概念接近李察森折射真實的稜鏡概念,但也與這種概念有巨大差異。衍射和折射不同,指的不單純是真實的象徵建構或社會建構〔或「建立有文字的世界」(Austin, 1965)〕,也認為研究是一種力量,從象徵和物質的角度來改變或創造真實。因此,如果折射指的是一項過程,且在此過程中,通過稜鏡的景象會有所改變,那麼衍射指的便是一種方式,藉由這種方式,作為視覺和物質力量的光通過稜鏡時也會轉變(Clough, 2000: 162)。

研究可作為象徵性建立真實的過程,亦可作為象徵性及物質性建構真實的過程。這兩個概念的差異可經由後結構運動兩大巨頭長久以來的爭論加以說明:德希達和傅柯的爭論。德希達的論點是,十九世紀的啟蒙「理性」(rationality)是透過瘋狂或者「非理性」的創造或新「科學性」定義來構成自身,要不然就是藉此來正當化自身。傅柯(Foucault, 1976)反對這種論點,並指出這種「行動」絕對不只是涉及純粹語言學定義,原因是這種行動要求把瘋子鎖進療養院中,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也造成他們終生在身體上、社會上及情緒上失去依靠。這樁事件強調的是,研究和科學並不會讓這世界「看起來」具有特定面貌,而是研究和科學就像精神病學一樣,帶來某種非常具體但有時非常有問題的世界。回到薩摩亞的問題,我們可以指出針對那些島的人類學研究,是各種殖民主義及反殖民主義政治的一部分。這些政治不只是描述島上生活或賦予其意義,而是各種過程的一部分。這些過程造成薩摩亞根本的文化、政治及經濟變化。

研究時的物質－符號觀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雙面的:

1. 讓人注意到實證主義的限制,原因是這種觀點強調研究永遠不客觀,而只是會改變物質-符號力量的真實,

而物質－符號的力量必有其目的，或者必具有政治性。

2. 這也讓人注意到社會建構的觀點，原因是物質-符號的觀點強調下述的事實：研究無法任意創造現實，或僅僅透過說不同故事的方式來創造現實。諸多錯綜複雜的文化/政治/經濟/生態過程促成了研究，也限制了研究。若我們要介入，就必須瞭解這些過程。

因此，物質-符號觀點看待真實本質的方式(本體論)及我們得以理解真實的方式(認識論)，和實證主義及稜鏡觀點皆有所不同。這種觀點並不將真實視為需要經過描述的固定實體(實證主義觀點)，亦不將其視為流動、如黏土般的事物，能夠雕塑成不同的真實(稜鏡觀點)，而是體認到真實和研究間的關係，必須是一種互動。因此，物質-符號觀點體認到研究並非描述世界，而是「創造」世界，並強調真實存在於研究之上，有可能會「反擊」，而使某些類型的研究及結論比其他的更合理(Massumi, 1992)。這代表這種觀點偏離了稜鏡概念中「書寫不同真實」的部分，主張有一種「以物質」調和而成的「創造」概念。這種觀點承認現存的社會及物質環境必定會促成研究、限制研究，若要改變社會不平等的架構或生態真實的基礎，就有必要瞭解這些架構及基礎。

和「稜鏡」觀點類似，在這種結構下的研究目標是提出更多不同觀點得以滲入的研究。然而，稜鏡的概念將這種目標以多元化的角度解釋，讓各種聲音及真實都能為人所聞。哈樂葳(Haraway, 1997)和哈定(Harding, 1991, 1993, 2001)以略微不同的方式，以更平等主義的角度，來將結合不同觀點的目標視為一種手段，目的是要促進更平等的科學、社會以及經濟架構。哈樂葳借用哈定的說法，稱這種方法論取徑具有「強烈客觀性」。強烈客觀性意指努力納入各種觀點(特別是

受壓抑族群的觀點, 例如薩摩亞女孩, 原因是他們可能會批評現有的知識型態), 以製造出對世界更兼容並蓄、更周全, 也更準確的描述。哈樂葳(Haraway, 1998)承認研究不可能客觀, 必定具有偏見或「因地制宜」。然而, 這並不構成目光或心胸狹窄的藉口。反之, 既然研究必帶有政治性, 我們就更有倫理責任來瞭解「我們正製造何種真實及存有、從誰身上得出這些結果, 又是為了誰製造這些結果」(Haraway, 1997: 58)。這代表我們應該對我們特定的研究謹慎小心, 原因是這項研究或多或少都創造出其看待的真實, 例如肉慾的或危險的「原始人」這種概念, 這些概念造成了諸多論述及行為用以支持性解放、觀光業、無數的電影與媒體形象還有節育運動。根據哈樂葳及哈定的說法, 為了不製造出心胸狹窄、有種族主義的研究造成不平等長期存在, 研究必須精確, 並使用「有系統的方法」, 以助納入各種研究現象的不同觀點, 並加以批判性地評估。這種系統化評估各種觀點, 特別是受壓抑觀點的方式, 有助產生的研究更兼容並蓄, 或在科學上更嚴謹、更注意到研究的政治及道德意義。

在物質－符號觀點之內, 結合各種方法論及方法論中各種效度的目標, 就是為了產生對這世界「更好」或更周全的描述, 或是製造出更周全的世界。對話的原則允許學術行為融入不同族群, 特別是權利遭剝奪者(例如薩摩亞年輕女孩或「瘋子」)的觀點。解構有助於批判性地分析針對「原始人」或「精神失序者」長期沈澱下來的論述。這些論述看似真相, 實際上只傳達出少數人的政治, 因此足以開啟空間, 容納各種更平等的新觀點。脈絡化的觀點使我們理解原始性慾特質和精神失序的概念, 如何與複雜的社會、政治及經濟架構, 例如殖民主義、優生學或自由人文主義對差異的興趣與著迷交織在一起。整體來看, 結合各種方法論有助帶來「強烈客

觀性」, 製造出更「準確」、更平等的知識。

四、方法論對話

儘管物質-符號觀點有許多優點, 但這種觀點有一個部分讓我不安。衍射的概念(以及反射及折射的概念)都和視力有關, 而視覺正是最線性, 且最無法互動的感官之一。物質-符號觀點的視覺邏輯在哈樂葳及哈定等人文章中大放異彩, 他們的文章採取了較為傳統的觀點來看待實證研究及書寫中的實用性。因此, 這些學者瞭解「強烈客觀性」指的是研究有系統地結合各種不同的觀點, 包括受壓抑的觀點, 然後融合在一起, 使其成為更兼容並蓄, 更準確的科學描述, 具有打擊社會不平等及排斥的政治信念。這種立場和傳統的研究原則不同, 原因是其雖採取了一種政治立場, 但卻「修正」信念, 在「科學上」恪遵傳統結合研究的方式, 亦即將其他觀點轉換為科學性的觀點, 遵守疏離、持久及控制的視覺邏輯。

依我之見, 視力的架構並未能充分說明兼容並蓄的理念, 或研究會與真實互動的概念。此架構顯示「物質-符號之研究本質」這種概念很薄弱, 其中稜鏡的概念會很強勢, 後者就是聆聽不同世界的肌理與幽微之處的對話原則。因此, 我希望回到李察森(Richard, 1997, 2000; 亦可參見 Denzin, 1997a)的概念, 亦即配合某些團體或某些生活領域的運作模式時, 方法論及書寫模式可能會隨之更好或更差。因此, 為了準確說明如薩摩亞女孩等人的生命真實, 我們必須有合作或對話性的研究策略, 及更具詩意的書寫風格。同理, 脈絡化的分析及寫實主義的書寫方式可能適合調查殖民主義的文化、政治及經濟架構。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將女性及生命經歷貶抑為情緒的/想像的/私人的, 而政治和經濟是脈絡化的

/寫實的/公共的, 原因是這可能會鞏固不平等及充滿限制的架構(女人要慈愛, 而男人要能控制)。反之, 這種觀點強調閱讀、書寫或銘刻真實的模式必定是政治性的, 而且除非我們公正評論這些模式的具體程度, 否則我們會有無法察覺所有社會及受壓抑觀點、價值觀及利益的風險, 而這些都是我們想要納入更兼容並蓄、更平等及更多元化的研究中的事物。

「周全」觀點的理想根植於強烈客觀性的概念之中, 會使人注意到普遍性, 而稜鏡的概念則強調捕捉特殊性的重要。但若我們要想像一個在普遍及特殊之間的方法論位置, 最好能將感官從視覺轉化為聲音或對話。視覺將真實切割成一個真實的觀點(實證主義)或幾個不同的觀點(稜鏡), 或一種特殊但無所不包的觀點(物質-符號觀點)。聲音或對話的比喻則以較具滲透力或互動的角度, 看待不同的真實。聲音的概念不認為要將不同的真實融為一個觀點, 或捕捉不同的真實, 而是以聲境(soundscape)的角度來想像不同的真實及方法論。各種聲境都有自己特殊的和弦, 但也與其他和弦產生共鳴, 彼此互動。爵士樂喇叭手的獨奏就是一個例子。獨奏會轉換成觀點自己的腳踏聲, 並且與其他多元文化的聲音與當代都市社區互相激盪(參見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530-50)對旋律的看法, 可從中獲得啟發)。在各種氛圍(milieu)中, 爵士樂的聲音都會產生不同的和弦; 但藝術/表演性、收錄於唱片中的及都市/政治的各種爵士樂面貌也彼此交流。同樣地, 不同性慾特質之生命經驗、傳達性慾特質的文化、政治及醫學論述, 以及性慾特質造成的科學、社會經濟及全球政治體制, 也以不同的語調發聲, 並談論不同的性慾特質; 然而, 這些性慾特質也彼此共鳴及互動。因此, 結合各種方法論而以聲音為基礎的取徑, 以及這些取徑的效度, 得以促成多面向的研究策略。這種策略尊重各種不同調查/真實模式的具

體性，也指出結合各種不同方法論及真實的統一及重疊之處。

為了說明結合各種方法論而以聲音為基礎或對話性的取徑之面貌，我會概述一種可能的方式，以從不同角度分析薩摩亞女孩的性慾特質。我的目的不在說明米德或弗利曼當初應該如何進行研究。我們無法藉由當代標準或社會議題來評斷七十年前或二十年前進行的研究，即使他們提出的問題到今天仍適用。反之，我只是利用米德和弗利曼的論戰，以提供一些進行多面向研究時的啟發式概念，這跟福婁(Frow)及莫里斯(Morris, 1992)概述研究購物商場的方式、但從未真正加以研究的精神很類似。

因此，如果要開始分析薩摩亞成年女孩的生命經驗，我們可以利用詮釋性或對話性的取徑，並設法(與那些女孩合作，並能批判性地注意到自己可能阻礙瞭解這些女性的文化包袱)從這些觀點中捕捉到問題。同理，在多音性的精神下，我們可以設法從男孩、年長村民、男性以及女性的觀點中來理解性慾特質的問題。如果我們要研究的論述，傳達了我們及他們理解女孩性慾特質的方式，我們便可以藉由批判性地檢視西方社會心理學論述作為開始。西方社會心理學論述認為成年女性的性慾特質是一種問題，也是痛苦的根源，而這種論述正是米德希望加以問題化的。我們可以討論這種論述的起源與政治。這種論述控制了女性性慾特質，將其視為「問題」，並且設法「解決」。解決的方法不是防衛性地強調禁慾，或要求有免於壓迫的自由，就是贊成「自然」性慾特質。接下來，我們可以繼續研究這種論述一開始是如何與「原始」性慾特質的概念交疊在一起。原始性慾特質的概念可用來支持淫亂或「自由」的性行為，將其視為「自然的」行為。再者，我們可以調查這種關於「原始」性慾特質的論述，如何構成殖民主義、優生學及觀光業的論述。這些論述認為來自

南方的人重視「性」或「身體」甚於「心靈」,較接近「動物」而非「人」。我們可以繼續檢視這些針對性慾的種族主義論述,如何構成殖民主義及後殖民主義軍事、政治及經濟規則體制的一部分。這些體制在薩摩亞之類的地方,大大影響了當地的生活及社會。然而,我們也可以研究自然、活潑的性慾特質,如何構成社會思想及行動體制的一部分,例如米德的文化主義式自由主義。這些體制的矛盾,對抗了種族主義的政策。最後,我們可以再繞一圈回來,從西方傳教士及其他「文明化」的任務,到今日的當代全球媒體,來研究和性慾特質有關的全球論述及行為,如何導引薩摩亞性慾特質的規範性概念。如此一來,就可以想像訪問薩摩亞女孩時,我們可以聽到地方文化的回音、社會心理學對於成年人性慾特質的概念,以及西方對「原始」性慾特質的詮釋。

這類研究無法回答下列的實證問題:薩摩亞的女性性慾特質面貌為何?反之,這類研究會研究根植於不同論述中的政治。這些論述無論就象徵或非常具體的角度來看,都製造出薩摩亞女孩的性慾特質,以及其他各種性慾特質依附其上的行為及議題。然而,捕捉根植於年輕女孩性慾特質之私密經驗中的「政治」,構成優生學與針對性慾特質的異國情調化論述基礎之政治,以及這些政治與殖民主義及反殖民主義政策的關係,會需要不同的方法論及書寫文類,以致這三種觀點的「結果」可能看來在討論另一種真實。如果我們要忠於提升研究,以及納入對世界的不同觀點並加以公正評價的計畫,捕捉這些觀點的特殊性就很重要。

促使不同方法論及政治觀點彼此對話,能培養出多面向的研究及政治,而這些研究及政治能注意到社會現象的複雜度,例如薩摩亞的性慾特質。這項研究策略並不嘗試提出一種開明的觀點(三角交叉驗證法),或承認有多重觀點(稜鏡觀

點)。反之,多重觀點的研究目的在於保持不同觀點間之創造性張力(creative tension)。舉例而言,米德作品為研究薩摩亞性慾特質的一部分,若有人要從對話性或多重觀點的立場檢視其社會意義,可能會的得出不「好」也不「壞」,而是複雜的結果。一方面,米德賦予薩摩亞人異國情調,最後肯定了西方對普遍感官及自然「原始性」的比喻。從對話性的觀點來看,米德的自由人文主義在認識論上或在政治上既非「正確」,亦非「不正確」,但兼具「兩者」正確之處「及」錯誤之處。這種對話性培養出的研究及政治,能夠體認到社會問題的多重面向,而不訴諸單面向的判斷。

以我剛才提出的方式來探索不同觀點及運用不同的方法論是確實可行,但需要耗費龐大心力。我的目的不在建議每一項研究計畫都應該匯集多種觀點,但我希望強調的是,即使我們僅研究某種事物(例如薩摩亞青少年的性慾特質)的單一面向,牢記這種事物可從幾種角度來進行研究,同時也是更大的謎題一部分,仍會有所幫助。我們可能希望透過生命故事訪談的方式,來捕捉薩摩亞女性的生命性慾特質。然而,我們必須記住,這名女性的描述可能會和所有在地及全球針對女性及原始性慾特質的論述交織在一起,而且兩者皆強烈批判而又支持這些論述,以及透過它們發聲的政治議題。因此,生命故事是:(1)生命真實的表達,可以透過對話加以瞭解;(2)社會論述得以穿透,透過解構可加以拆解;(3)構連起廣泛的地方、國家及跨國政治,以脈絡化地進行分析。因此,即使我們研究一個特定的部分(例如生命真實),瞭解其包含的多重面向仍會有所幫助。我在訪問罹患厭食症的女性時發現這一點,各種論述穿透她們的故事,這些論述定義了厭食症及其他與這些論述矛盾的國家、跨國及極度性別化的政治與社會議題。我愈研究米德與弗利曼的爭論,就

愈能理解厭食症的論述及薩摩亞青少年性慾特質論述之間的共通之處。在兩個例子中，女性身體及自我的「真正」本質成為戰場，而且也成為一場戰役，亟需諸多複雜的個人與政治鬥爭參與其中。因此，結合各種方法論來研究我們身體及自我的私密經驗，如何與將我們與遠方的人結合的全球權力體制產生關連，可能會增強跨地方(translocal)的政治。跨地方的政治會質疑那些壓抑我們的力量、論述及行為，同時準備好思考意見及利益的重大差異，也準備好協調這些差異。簡言之，此研究方式會用來促成平等主義的政治；這種政治承認一部分的平等主義計畫勉強地接受了下述事實：平等可能會有不同的面貌。

陸、結論

文化研究的方法論計畫之架構是環繞生命經驗、論述或文本及社會脈絡中三個面向的興趣，這種計畫的挑戰在於三個重點領域指的是三種不同的方法論取徑。理解生命經驗需要詮釋性或現象學的取徑，目的在理解生命真實。對論述的興趣需要的是(後)結構主義對比喻及模式的分析，這些比喻及模式塑造了我們對自身社會、文化及研究環境的理解。然而，分析社會及政治脈絡必定要與某種寫實主義的形式結合。寫實主義希望理解社會及社會架構如何「真正」運作。這三種方法論取徑可能彼此截長補短，互相補充，但這些取徑也可能有矛盾之處。我們無法輕易結合詮釋性的探索方式可理解生命真實，(後)結構主義的興趣則在批判性地分析傳達那些真實的論述，兩者難以輕易結合。同時，詮釋性及(後

結構主義)取徑的興趣不是多重真實,就是在所有真實的本質,這和寫實主義理解社會真實的計畫有所衝突。再者,新的民族誌、後結構主義及全球化(這些事物也要求研究更忠於不同的真實,而且能夠理解越來越重要的全球真實)也帶來新的哲學及實務挑戰,這會使不同研究更涇渭分明,並強調有必要進行學術界及政治界的對話。

在這種情況下,效度代表真實性的舊有觀念似乎不再可行。反之,有人建議我們應該開始討論各種效度,而非單一效度。文化研究對真實的生命、論述及社會/全球等面向有興趣,在這樣的背景及最近方法論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提出三種不同的效度。首先,對話性效度評估研究如何保持對研究對象生命世界的忠實度,藉此評價研究。第二,解構性效度評估研究價值的方式,是透過檢視此研究是否徹底地察覺到社會論述及比喻,這些論述及比喻傳達了我們對真實的理解,並架構出我們的研究。第三,脈絡性效度評估研究如何在更廣大的社會、政治及全球脈絡中,為這些現象及研究本身定位,藉此估計研究的效度。

這三種效度結合在一起,強調出良好或有效的研究之不同條件。同時,這些效度提出問題,質問這些不同的效度及隨之而來的的方法論取徑能否結合,以及結合的方法。在社會及文化研究中結合方法論的傳統方式是三角交叉驗證法。三角交叉驗證法指的是使用不同的方法,以獲得關於社會真實更準確的概念。然而,利用三角交叉驗證法的啟發以結合三種不同效度及方法論的問題是,這些效度及方法論不見得符合準確的真實面貌,原因是它們探討了單一真實或不同真實的不同面向。李察森(Richardson, 2000)認為我們應該開始談論稜鏡概念,而非三角交叉驗證法。稜鏡概念強調我們改變看待真實的方法論觀點時,真實就隨之改變。稜鏡概念公正評

價理解真實的不同方式之間，可能有的重大差異，但問題是這忽略了一件事實：即使我們可能以不同方式研究全球的、社會的世界，這個世界仍將我們的命運繫在一起。因此，利用李察森的稜鏡概念及哈樂葳建構真實的物質-符號概念，我認為可以藉由創造兩者間的對話，結合方法論的取徑。進行研究的對話模式會注意到我們的各種真實中，生命、文化、社會及物質的面向，並承認這些面向間可能會有斷裂之處。這種模式目標是培養出社會及文化分析的各種模式，這些模式會注意到不同的真實，而且能夠建立起彼此間的橋樑。希望這種研究模式也能鼓勵結合不同團體的政治，藉助他們不同的關切及觀點，能開始建立一個普遍且更平等、多元化的世界。

練習 1

- 設計一個研究策略用來研究您選定的主題。思考您會如何利用下列三項指導原則：(1)對話性效度；(2)解構性效度；(3)脈絡性效度來研究您的主題。
- 討論這三種取徑為何互相矛盾或彼此截長補短。
- 您認為這些研究取徑中有沒有哪一個較適合用於研究您的主題？為什麼？
- 若您只用一個觀點，例如生命經驗，會是最好的選擇嗎？您會使用何種研究策略或方法來探討您的主題？您如何藉由分析其他融入您偏好的方法論觀點之取徑(舉例而言，藉由分析論述如何與經驗交織在一起)來充實這種觀點？
- 研究您所研究的現象之生命、論述及社會/全球面向適當嗎？您要如何以可控制的方式來研究這三種面向？您要如何結合不同的分析方式，而不舉出(1)嚴格的因果關係(「社會脈絡決定經歷過的生活」)或(2)不同觀點沒有交集的情況(「生命經驗談論的是少數人，而社會脈絡談論的是大歷史，兩者談論的是不同的真實」)？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本試閱版僅提供尚未上市的校稿版本，目的是為了方便讀者先睹為快。所以，此試閱版本不論是內容或排版，都與最後上市的版本，仍有某種程度的差異。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正式送印之前能做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